

“粉红色队伍”指挥官余亚农

张卫强

史事经纬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推动下，安徽人民为保家卫国，踊跃参加抗日军队，打击侵略者。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是当时皖北的一支重要抗日地方武装，组建于1938年5月，总指挥余亚农，在余亚农的带领下，第五路军拥护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共同抗日的原则，公开提出“一切向新四军学习”的口号，坚持与新四军密切合作，共同打击日伪，被称为“粉红色的队伍”。

早年曾多次参加反蒋、抗日活动

余亚农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大革命时期，他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联军，率部打击北洋军阀。“二次北伐”期间，日军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余亚农率部防守黄河大桥，与日军激战。1929年，时任国民革命军一三二旅旅长的余亚农，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率部起兵反蒋，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余亚农协助王亚樵秘密组织铁血锄奸团，分工为“抗日宣传，并调查了解日本间谍、汉奸情况，以作为打击对象”。1933年，他参加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福建事变发生后，余亚农日夜赶往福州，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会合。1934年事变失败，余亚农又返回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反蒋、抗日活动。

1936年8月，余亚农受李济深、朱蕴山等人的委托，与张献廷一起持密信去延安，“联系共同反蒋、抗日事宜”。他在延安逗留一个多月的时间，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

全面抗战爆发后，率部和新四军互相配合，共同抗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余亚农在周新民、章乃器、朱蕴山等进步人士的支持下，接受李宗仁的邀请出任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指挥官。1938年春，余亚农召集旧部，组建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该部分为3个支队，共4000余人。第五路军创建不久，余亚农便率部出征，与日军发生多次激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9月8日，余亚农率第五路军的二、三支队收复亳县县城，并将指挥部迁往该地，接着又配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收复了涡河以北的汪伪据点乌山庙。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安徽人民的抗日斗志。从此，余亚农和他率



余亚农（左八）和新四军指挥员在亳城会谈后留影

领的第五路军在安徽的声誉日隆，其部队也迅速扩大到15000余人。

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司令员彭雪枫的领导下进入皖北后，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泛深入地进行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间，彭雪枫派联络科长任泊生与余亚农联络。余亚农亲往会见彭雪枫和支队各位首长，要求派干部帮助第五路军训练部队，互相配合，共同抗日。

应余亚农的请求，彭雪枫先后派20多名中共党员及50多名干训班学员到第五路军帮助工作。共产党员王少庸被委任为余部参谋处长，其他党员被派往二、四支队担任领导工作。王振鸿以干训班学员为基础成立教导队，学习新四军的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经验，用新四军的办法为第五路军培养军政干部。当时，第五路军还出版了一份名为《拂晓报》的油印小报，负责办报的都是共产党员。1939年春节，余亚农亲率大队以上干部前往彭雪枫的支队司令部拜年，并邀请彭雪枫到该部作了题为《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抗战前途》的报告。春节过后，彭雪枫和副司令员吴芝圃、参谋长张震及豫皖边工委书记张爱萍等到亳县县城与余亚农会晤，商谈统战、抗日事宜。

不久，余亚农在第五路军中公开提出“一切向新四军学习”的口号，并在行动中予以积极落实：在军事上，要部队注重学习新四军的游击战术，不去专搞制式教练；在政治上，学习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在每个中队设指导员，负责思想工作和文化工作，并规定其与中队长具有同等的权力；在生活上，实行官兵一致……经过一番整顿后，第五路军的政治军事素质明显提高，与国民党的其他部队有了明显的区别。在当时的第五路军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响彻军营，部队中有很多人阅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国民党顽固派对余亚农向新四军学习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们不怀好意地说：“第五路军成粉红色的了。”余亚农听后回答：既然第五路军是“粉红色的队伍”，那我就是“粉红色队伍”的指挥官。

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

随着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第五路军也在新四军帮助下不断发展壮大。李宗仁辞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后，该职由国民党内另一位新桂系将领、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接任。廖磊上任后，为扩充自身的实力，便想方设法把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的各支武装予以吞并。他召开由自卫军各路指挥官参加的会议，布置所谓“整编事宜”。前来与会的余亚农看破其伎俩，便当众提出自卫军官兵多，而整编方案规定每路军整编为一个团，不仅规模太小，无法容纳。且大敌当前，对团结抗日的大局不利。由于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将领支持余亚农的正确意见，使廖磊的吞并计划失败。廖磊气急败坏，在余亚农返回驻地途中将其绑架。

余亚农被扣的消息传到第五路军中，引发了全体官兵的愤慨。他们立即自发组织进行营救行动，将部队向亳县方向集中。第五路军呼吁营救余亚农的电报发出后，引起各界的强烈反响。安徽地方知名人士群起谴责廖磊。其他几路抗日自卫军首脑也声明：如不放出余亚农，将以兵戎相见。迫于压力，廖磊不得不释放余亚农。此次事件，使余亚农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在一次讨论部队今后去向时，有的人主张：“五战区不容，我们到一战区去。”余亚农听后，感慨地告诉大家：“到哪个战区都一样。大家如不愿当亡国奴，只有参加新四军。”

1939年10月，廖磊因病死去，李品仙继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酝酿发动“反共高潮”，因余亚农与新四军彭雪枫部合作良好，李品仙立即宣布取消“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的番号，撤销余亚农的指挥官职务，将第五路军改编为“第五战区第十一游击纵队”的一个支队。消息传来，第五路军上下无比愤慨。余亚农在广大官兵的支持下，决定

“抗编”。他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新桂系集团在安徽排斥异己、破坏抗战的行径。李品仙得到消息后恼羞成怒，下令通缉余亚农，并派出大军对第五路军进行“讨伐”。在李品仙的威逼利诱下，第五路军的一些军官发生动摇。为了避免爆发内战，余亚农率部转移到河南鹿邑一带，继续和新四军联合抗日。汪伪政权得到消息后，以为有机可乘，立即派人以“友人”的身份对余亚农进行拉拢。余亚农严词正告人说：我是中国人，我有抗日的自由，谁也不能剥夺我不愿做亡国奴的权利。

同年冬，第五路军被国民党顽固部队包围缴械，余亚农也被逮捕，后经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及社会人士营救获释。此后，他流亡于苏、鲁、豫、皖之间，在淮北经营耕地，以资糊口。在流亡生活中，余亚农更加主动、积极地接近共产党，并联络各阶层进步人士，为抗战和统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与共产党通力合作，为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作出应有贡献

日本投降后，余亚农应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政委员会邓子恢之邀，赴苏北解放区共商开展反内战活动，后经沈钧儒、沈志远介绍，加入民主同盟。他曾两次到山东，与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兼华东军区区工委书记曾希圣等商讨在国民党军中开展兵运工作。1948年民革在香港成立后，余亚农在合肥建立民革小组，在国民党部队内进行策反工作。1949年，余亚农与中共地下工作者一起在宁、沪、芜间进行策动起义活动，配合解放军进行渡江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余亚农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皖北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任、皖北行署监委副主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副省长等职。1959年去世，享年72岁。中共安徽省委在余亚农病危时，根据他本人的请求，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作者单位：民革芜湖市委会）

红色足迹

陈锐霆率部起义前后

赵荫棠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不久，蒋介石又调集大军，向新四军华中部队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其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新四军第四师及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三四月间，国民党顽军占领安徽涡阳和蒙城后，又继续向涡河以北进犯，其九十二军第一四二师第四二五团进到怀远县的诸寨一带。

四二五团团陈锐霆是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中共秘密党员。他认为，如果率部举行反内战起义，将有利于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彭雪枫指派师侦察科科长罗会廉、联络站站长任泊生和陈锐霆取得联系，并介绍了新四军敌后抗日和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情况。陈锐霆告诉罗会廉，国民党军就要渡河向新四军第四师发动进攻的消息，并详细告知了进攻地点、时间及兵力部署，并表明他起义的决心。

彭雪枫听过罗会廉的汇报后，立即发电报向延安请示。中共中央决定：由彭雪枫主持组织起义活动。4月19日，四二五团千余名官兵在陈锐霆的率领下，越过津浦路东进，举行战场起义。20日上午，起义部队和新四军四师三十二团会师，陈锐霆与彭雪枫见了面。随后，起义部队进入淮北抗日根据地泗县以南的郑集地区，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参加新四军后的陈锐霆

当时，随四二五团北犯的国民党军第十四游击纵队第一支队牛肃久部，进驻怀远县双桥集以东的大小郭家地区。为掩护起义部队转进，新四军第四师集中二十八、三十二团两个团的兵力，于20日17时，向顽军牛肃久部发起反击。二十八团自东向西，三十二团自西向东实施两面夹击，激战1小时，将小郭家顽军全部歼灭，俘虏80余人。

驻扎在大郭家附近村庄的顽军见状，立即向大郭家收缩。第四师部队迅速挺进至大郭家外围，将村子包围后，于21日1时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发起总攻。

经2小时激战，除牛肃久率少数卫士跳河逃走外，顽军全部被歼。此战，新四军共毙伤顽军数十人，俘副团长以下250余人。4月23日，新四军领导在新四军九旅驻地举行欢迎大会，宣布四二五团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由陈锐霆任旅长。

罗板铺伏击战

吴小龙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根据1938年10月22日琼崖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积极为红军改编做准备。1938年12月5日，琼崖红军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简称独立总队），冯白驹任独立队长。改编后，独立队立即转入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经过两个多月的军政训练，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政策水平和作战能力均有很大的提高。

1939年2月，日军在海南岛登陆。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的独立队，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组织起随军工作团，大力开展抗日宣传，广泛发动和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抗日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和地区性的抗日武装组织。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队的行动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纷纷捐粮、献弹、筹款、出粮支援抗战。许多爱国青年也报名参加了独立队。

1939年3月，独立队正式扩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总队（简称独立总队），下辖3个大队和1个特务中队，人数从原有的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独立总队成立后，更加积极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和日军作战十次，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延缓了日军向海南岛内地纵深发展的行动。

8月，日军在琼山县道崇乡滨洋村修建了据点，派出重兵驻守，企图借此来遏制琼崖独立队在琼山县咸来、道崇一带的活动。

史海观澜

张篷舟火线采访

黄宗慈

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淞沪抗战爆发。《大公报》十分重视战地通讯，立即派出张篷舟等一批年轻力壮、勇敢无畏的记者，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采访，及时报道中国军队的抗战消息。

刚刚30岁出头的张篷舟，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深入硝烟弥漫的前线进行现场采访，并抢拍了许多珍贵的战斗场面。为了保证采访到最新消息，他不惜重金雇请出租汽车，每天往来于炮火连天的前沿阵地间。每天除紧张的采访外，一有时间便将采访内容整理成文，然后连夜通过电话（很多时候是通过前线的前线电话）口诵笔述回报社编辑部。

每天晚上，编辑部将当天的版面全部编排好，单单空出重要新闻版面，专门留登张篷舟的采访消息。当时没有录音设备，值班编辑随听、随记、随编、随排，确保真实可靠的消息、报道第二天一早就能见报。由于张篷舟等的辛勤工作，《大公报》报道的战地新闻总是比其他报纸“快一步”。

一天，张篷舟乘车赶往前线，途中遭到敌机空袭，汽车翻入沟底。他侥幸没有受伤，爬出汽车，继续步行前进，冒着生命危险继续进行战地采访。回来后，同事

劝他小心，他笑着回答说：“我是命大福大，这次大难不死，将来必有后福。”他还口占一绝，以明报国壮志，诗曰：“民族抗战八一三，不杀倭奴誓不还。自信书生能报国，但凭秃笔斩楼兰。”

8月下旬，战斗更加激烈。张篷舟不顾个人安危，继续活跃在战斗第一线采访。为了降低被敌机、敌炮击中的风险，并加快采访进度，张篷舟找到一位驾驶三轮摩托车驾驶员，拉着他纵横穿梭于崎岖的道路和阵地之间。一次，两人正在前行，突然一发炮弹袭来，两人立即被巨大的气浪掀翻在地，张篷舟面部受重伤，血流如注。他经过简易包扎，强忍剧痛，跨车前进，终于完成了采访并及时将报道传回报社，才去战地医院接受治疗。其间，一位作战参谋和他搭话，称他为“勇敢之人”。张篷舟笑着随笔写下“流无代价的血，遇有趣味的人”以赠之。

在淞沪会战的三個月期间，张篷舟以“杨纪”为笔名，先后发表了52篇战地报道和23篇专论，并配以多张图片，真实地反映了我军将士浴血抗战的壮烈场面，歌颂了他们可歌可泣的伟绩，鼓舞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后来他的作品被汇集成为《上海之战》《沪战实录》等书出版，引发民众争相阅读。

八路军第一纵队取得孙祖大捷

贾晓明

九个像手指一样的小山峰。在孙祖与九子峰之间，还横贯着一条小沙河。这里山岭崎岖，沟壑纵横，是伏击敌人的理想场所。

3月15日夜间，八路军各参战部队到达九子峰后，迅速进入阵地，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3月16日清晨，中共山东分局党校警卫连按照既定部署，率先发起攻击，节节抵抗敌人，引诱“扫荡”的日伪军来到九子峰山下。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立刻遭到埋伏在山上的八路军战士的迎头痛击，被毙伤30余人。敌人稍作退却后，随即兵分两路——一路在大路附近寻找隐蔽物就地抵抗，吸引八路军的火力，另一路拼死渡过小沙河，企图夺取河对岸的一处制高点，打开一条逃生通道。敌人向一处山岭进攻时，遭到埋伏在山上的八路军战士的猛烈射击。敌人被击退后，又企图从西南方向冲开缺口逃脱。见此情

况，正在指挥战斗的第二支队首长立即命令部队迂回到敌人后方，堵住敌人的退路。敌人见退路被切断，不得不掉回头，和另一股敌人汇合，准备强攻九子峰，从正面冲出包围圈。

在炮火掩护下，敌人疯狂地向八路军阵地发起仰攻。守卫在九子峰的八路军指战员沉着应战，当敌人冲到离阵地只有30米左右时，突然开火，很快就击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冲锋。敌人不甘心失败，在激烈炮火的掩护下，很快再次发起冲锋。八路军指战员坚守阵地，和敌人反复搏杀，接连打退了敌人的七次进攻。

下午1时，敌人集中了所有兵力，发起更加疯狂的反扑，但始终无法撼动八路军的阵地。黄昏时分，随着第一纵队首长发出命令，坚守在九子峰上的战士们立即向山下的敌人发起冲锋。早已疲惫不堪的敌人放弃阵地，不断后退，很快被压缩到道路两边的

壕沟里。入夜，八路军冲入壕沟，与敌人展开白刃战，迫使残敌退入孙祖村。八路军随即将村子包围起来。战斗中，孙祖村附近的抗日民众自发组织起担架队、运输队、情报队，为子弟兵送茶送饭，送情报，运送伤员。

17日，八路军经过激战，夺取了村外的敌人工事。村内日伪军见状，只得焚烧尸体，准备逃走。八路军发现后，立即派一部埋伏于肖家坪至仁寿庄路口，切断日伪军退路；另一部乘日伪军据点铜井镇守备空虚，轻装夜袭，一举攻克该镇。

17日夜，八路军对孙祖村发起猛攻，激战3小时，毙伤日伪军百余人。残敌支持不住，便拼命向团北逃窜。敌人逃出不远，便遭到纵队警卫团和地方武装的伏击，大部被歼。

此战，八路军共击毙敌人120余人，击伤70余人，俘虏十余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军用物资和小推车60余辆。为了庆祝战斗的胜利，表彰和悼念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英雄，八路军第一纵队在孙祖镇召开了祝捷大会。会后，由抗大一分校创作的《孙祖战斗》《铁峪伏击战》《九子峰战斗》等系列歌谣，迅速传遍沂蒙抗日根据地。

编后拾遗

1940年3月，驻山东日军向沂蒙抗日根据地展开“扫荡”，遭到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八路军第一纵队首长将司令部设在距孙祖镇（山东省沂南县西南部的一个小集镇）4里处的东高庄指挥战斗。3月中旬，鲁中地区的日军获悉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活动情报后，立即调集沂水、莒县、宋位、东里店、铜井等据点的日军300多人，伪军100多人，向孙祖镇一带发起“扫荡”，妄想消灭八路军第一纵队主力，破坏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第一纵队首长得到报告后，决定抓住战机，集中纵队第二支队、纵队警卫团、第五支队连营及地方武装，在九子峰一带设伏，歼灭来犯之敌。所谓“九子峰”，是从东南到西北方向有一道连绵起伏的山岭，岭上有